

中國入朝參戰 若干問題的再探討

• 陳 兼

摘要：1950年10月，在毛澤東的主導下，中共領導層克服內部的意見分歧，冒着可能與美國全面開戰的風險，作出了派兵入朝參戰的決定，目標是「在朝鮮境內殲滅和驅逐美國及其他國家的侵略軍」。在這一決策的背後，固然有着保衛東北邊境安全的考慮，但在一個更為深入的層面，毛希望看到的則是通過高舉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的旗幟，將朝鮮戰爭所帶來的挑戰轉變為在國內實行廣泛及持久的群眾動員的動力，從而極大地加強普通中國民眾對於新政權及其宏大的政治和社會改造計劃的內在的認同和支持。中國參戰後，隨着志願軍的節節推進，毛和中共領導層仍堅持爭取在戰場上打敗美帝的目標，並在志願軍越過三八線後拒絕接受聯合國三人委員會提出的停火建議。但此後隨着志願軍的攻勢在第五次戰役中受挫，戰線又被推回到三八線附近，毛和中共領導層轉而採取「邊打邊談」的方針，直至交戰雙方於1953年7月27日簽訂停戰協定。戰後關於中國入朝參戰的歷史敘事，一直同中共領導層在各個不同時期對社會的改造和政治動員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成為激發普通中國人愛國主義情懷以及對於國家政策「內在支持」的一個持久不衰的源泉。

關鍵詞：毛澤東 斯大林 金日成 抗美援朝 三八線

1953年7月27日，持續了三年多的朝鮮戰爭以交戰雙方在板門店簽署停戰協議而告結束。然而，若同戰爭爆發時雙方之間的界線相比較，分割南北朝鮮的軍事分界線只有不大的變化，仍大致沿着北緯三十八度線（三八線）而劃定。七十年過去了，今日的朝鮮半島依然處在南北分裂的狀態，維護和平局面的依然是一個遠不如正式和平協定穩固的「停戰協議」，朝鮮半島也依然是潛在國際衝突的「熱點」。朝鮮戰爭作為冷戰時期的第一場大規模「熱戰」，以及中美之間的一場直接的軍事對抗，不可避免地吸引着國際學界的持續

關注。三十年前，筆者曾以當時可以接觸到的各方檔案文獻資料為依據，出版了《中國走向朝鮮戰爭之路：中美對抗的形成》(*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一書^①。此後四分之一世紀裏，又曾一再回到這個課題，發表了幾篇以不斷更新的檔案文獻資料為依據的新作^②。在這些論著中，筆者提出，毛澤東和中共領導層之所以派兵入朝參戰，除了保衛東北邊境安全的考慮外，其主要關注點在於，通過高舉革命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的旗幟，將朝鮮危機所帶來的挑戰和威脅，轉變為在國內實行廣泛及持久的群眾動員的動力。

值此朝鮮停戰七十周年之際，本文以新近完成、將於2024年出版的《周恩來和他的時代》(*Zhou Enlai: A Life*)書稿中關於朝鮮戰爭的一節為基礎，結合近年來的一些新的思考而寫成^③，其中就北京在朝鮮戰爭形成過程中的作用、戰爭爆發後的應對及準備、參戰決策作出的曲折過程、參戰後對目標的修正及相應的戰略轉變，以及參戰經歷和相關敘事對中國的長遠影響，提出一些新的看法，目的仍在於拋磚引玉，以求教於同行及讀者。

一 北京為金日成開「綠燈」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究其原因，這首先是半島上的共產黨革命力量同右派保守力量之間尖銳衝撞的結果，也同中國革命勝利的影響和全球冷戰的興起有着緊密聯繫。1949年4月下旬，朝鮮人民軍(人民軍)政治部主任金一秘密訪華。在和毛澤東、周恩來的會談中，金一通報了朝鮮半島的局勢，並要求將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軍)中的朝鮮族士兵送回朝鮮。毛當即表示同意，並提到如果南方進攻北方，或北方過早進攻南方的話，南方有可能引入日本軍隊，從而使北方在軍事上處於不利地位：「持久戰對你們不利，因為這樣日本就可能捲進來，並幫助南朝鮮『政府』。」因此，北方若同南方開戰，要從政治上是否有利來考慮問題，最好讓南方先進攻，再展開反攻。毛還說，「必要時，我們可以給你們悄悄地派去中國士兵」，但中國內戰還未結束，解放軍一時騰不出手來支援朝鮮，所以「類似北朝鮮進攻南方這樣的行動，只有在1950年初國際形勢有利於這一點〔中國援助朝鮮〕時，才可以採取」^④。

1949年7、8月間，由朝鮮族士兵組成的解放軍164師與166師的全建制回到朝鮮^⑤。在朝鮮領導人金日成看來，這些部隊大大加強了人民軍的進攻力量。9、10月間，他向莫斯科和北京提出，準備用武力統一朝鮮半島。斯大林從維持戰後東北亞現狀的既定立場出發，不支持金的要求^⑥。當時，中共領導層面臨的首要任務是「解放台灣」，他們因而希望在台灣問題解決前，金暫緩向南方發起進攻，以免造成局勢的複雜化^⑦。金不甘心，仍一再向斯大林提出進攻南方的要求。1950年1月底，斯大林的態度發生變化，表示願意在莫斯科接見金，當面商討進攻南方的計劃。但斯大林不想讓毛澤東知道或參與此事，他要求金對「此事要始終保密，不要同其他北朝鮮領導人或中國同志分享」^⑧。

不過，中共領導層並沒有被蒙在鼓裏。3月底，就在金日成訪問蘇聯的前夕，毛澤東和周恩來接見了朝鮮駐華大使李周淵，討論「金日成與毛澤東會見的問題」。毛同意在4月底或5月初（也就是金訪蘇之後）同金見面。交談中，毛直截了當地問李：「打算甚麼時候統一國家？」李未回答，毛便索性挑明：「如果你們想在近期在南方發起軍事行動，那麼，就不要進行正式會晤，在這種情況下應進行非正式來訪。」周則故意「建議〔毛和金〕正式會晤」，這分明是對朝方的一種試探。李沒有正面回答。毛說了一段大實話：「用和平方式是不能統一朝鮮的，統一朝鮮必須要用武力才行。對於美國人，不要怕他們。美國人不會為了這樣一塊小地盤就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⑨

4月1日，周恩來在中國軍事情報部門的一次全國工作會議上講話時，也有一番關於支援東方革命（包括朝鮮革命）的極富深意的表述^⑩：

我們今天勝利了，要有不怕擔當大任的精神，要擔當起解放全世界的重任，而且要有此氣魄。今後我們要幫助東方被壓迫民族兄弟的解放，如朝鮮、印尼、越南等國家，如果這些民族都起來了，都得到了解放，那不是全世界人民的力量就更大，帝國主義更容易崩潰嗎？

周上述對於中國當時所面臨的「國際大任」的分析，同毛澤東會見李周淵時對朝鮮統一問題的表態顯然有着一脈相承之處。毛、周等既然有如此想法，對於金日成通過一場「革命戰爭」統一整個朝鮮半島的想法和計劃，即便在發動時機等問題上持有異議，也絕沒有斷然否決的道理。

4月，金日成秘密訪蘇。斯大林同意金對南方採取軍事行動，但又告訴他：「朝鮮同志不應預計能取得蘇聯的巨大支援和支持，因為目前它比起朝鮮問題面對其他更為重要的挑戰。……如果你的牙齒被打掉的話，我連一點小忙都幫不上你，你必須請求毛澤東提供所有的幫助。」^⑪斯大林就這樣把球踢給了毛澤東。5月13日，金又悄悄地來到北京。聯想到3月毛和李周淵的談話，顯然他來是談對南方採取軍事行動的。毛當然會想到，如果沒有斯大林的批准，金恐怕走不到這一步。當天，毛澤東、周恩來一道同金見面。金果然提及，斯大林已同意進攻南方的計劃。會後毛馬上讓周致電莫斯科核實此事^⑫。這麼做除了對斯大林、金日成兩人先斬後奏的做法表示不滿外，應該還有兩層意思：第一，戰後朝鮮一直屬蘇聯「管轄」，此時金根據斯大林指示向中方提出進攻南方的問題，也就等於是讓中國參與此事，毛需要斯大林本人對此予以確認；第二，毛還需要確認，一旦中國因而捲入戰爭，蘇聯不能置身事外。

斯大林很快回電，確認他同金日成討論了進攻南方的計劃，但又表示，「如果中國同志不同意，則應重新討論這個問題」^⑬。然而，毛澤東並沒有行使斯大林給他的這個否決權。這裏其實還涉及到一個重要的情況：當時，由於遭遇到缺乏海空軍等一時難以克服的困難，考慮到攻台戰役的複雜性以及準備不足便貿然行動可能產生的嚴重後果，中共領導層已決定，在1950年內「不打台灣」，「奪取台灣的作戰，準備1951年進行之」^⑭。既然如此，他們當然沒有理由再阻止金發動以武力統一整個朝鮮半島的行動。毛在同金會談時

詢問，是否需要中方在中朝邊界地區部署幾個師，以便在必要時對朝方提供支援？金認為沒有必要。兩人還談及美國是否會干涉的問題，金認為美國不會。毛則表示，這種可能性不能排除，但更要注意日本僱傭軍參戰的問題¹⁶。

據蘇聯駐華大使羅申(Nikolai V. Roshchin)記載，毛澤東還說了這麼一段話：「蘇聯受到同美國在三八線劃定的分界線的限制，不便參加戰鬥行動，中國不受這方面的限制，所以很容易就能向北方提供幫助。」毛澤東、周恩來設宴為金日成送行時，金當着他們的面告訴羅申：「我和毛澤東同志談得很順利。他對我和斯大林同志在莫斯科達成的協議表示支持。」¹⁷實際上，毛不見得打消了對金進攻南方計劃的保留意見，但卻沒有否決金的計劃。而從金的角度來看，這等於是為他開了「綠燈」。果不其然，金回到平壤後，再沒有同北京打招呼，而是在蘇聯顧問的幫助下，自行其是地制訂了進攻南方的具體計劃，並加速了發動進攻的準備。

二 北京的「助戰」設想與參戰準備

朝鮮戰爭爆發以後，中共領導層首先着手應對的是台灣局勢的變化。6月28日，周恩來發表聲明，譴責美國海軍通過台海是「對於中國領土的武裝侵略，對於聯合國憲章的徹底破壞」¹⁸。同時，領導層進一步確定，對「解放台灣」計劃做出重大修正。30日，周召見海軍司令員肖勁光時說，朝鮮戰爭爆發「給我們打台灣增添了麻煩，因為有美國在台灣擋着。但也有好處，因為我們自己還沒有準備好。……打台灣的時間往後推延」¹⁹。

7月2日上午，中共領導層開會討論朝鮮局勢。究竟談了些甚麼，中方的相關檔案材料仍未解密，有關人士的回憶錄中對會議情況也未見披露或涉及。但根據俄國檔案披露，當天下午周恩來接見羅申時說，中共領導人上午開會討論了朝鮮局勢。羅申代表斯大林提問，如果美軍越過三八線，中國能否出兵支援朝鮮？周答道，中方已在東北集中了十二萬部隊，可以在美國越過三八線時投入作戰。但他強調，人民軍應繼續全力向南推進，也要在仁川等地留下強大的防禦部隊，以防備美國抄後路²⁰。斯大林收到羅申的報告後，於7月5日致電毛澤東、周恩來，贊成中方在中朝邊界的軍事準備，並表示，如果中國軍隊在美軍越過三八線時入朝作戰，蘇聯將「盡力為這些部隊提供空中掩護」²¹。

值得注意的是，羅申同周恩來的談話以及斯大林給毛澤東、周恩來的電報中都提到了三八線。從後來的發展看，這其實是斯大林為中國出兵援朝設下的一道「緊箍咒」：美軍不越過三八線，中國就不出兵，而蘇聯也不會支持中國出兵。中共領導層很快就發現，自此一直到9月聯合國軍(聯軍)仁川登陸及之後越過三八線前，斯大林的態度一直未變，實際上也成了中方入朝參戰(或更準確地說，入朝「助戰」)的一個主要瓶頸。

7月7日，「由周恩來主持，召集軍委之作戰、後勤及空、海、炮、裝甲兵各首長及總政羅[瑞卿]、肖[華]主任討論保衛國防及支持朝鮮獨立戰爭問題」。根據毛澤東及前幾日中央政治局會議的意見，該會議決定以「十三兵團全部

和四十二軍共四個軍、十二個師」組建總數約二十四萬人的「支援軍」，均「改穿朝鮮軍服，待由朝鮮取回樣式後，由後勤部布置趕做」；參戰部隊於7月底前全部運達本溪、安東、輯安一線，準備「支援朝鮮獨立統一戰爭」^⑲。三天後，周恩來又致電在東北主事的高崗，調動「第十三兵團及四十二軍與炮兵第一、二、八三個師至東北本溪至安東、通化至輯安線集結待命」^⑳。13日，中央批准建立東北邊防軍的報告^㉑，大規模的部隊調動也隨之緊鑼密鼓地進行。

7月12日，毛澤東、周恩來在北京接見「持金首相〔金日成〕函」前來的朝鮮副總參謀長李相朝。毛建議，應「命令部隊停止進攻，以便將主力拽成一個拳頭」，還提到中方已在中朝邊界地區集結了三十二萬部隊，「如果朝鮮需要支援，中國可以派部隊入朝」。毛要求金日成在8月1日前派一個「具有權威性的軍事代表團來北京」，並在10日前對是否需要中國派兵做出答覆^㉒。第二天，周向朝方要求提供朝鮮軍事地圖及人民軍軍服樣本，並通報朝鮮戰況^㉓。

8月初，中國軍隊的二十六萬精兵強將已完成在東北邊境一線的部署。同一時期，隨着美國增援部隊陸續抵達，朝鮮戰局逐漸陷入膠着狀態。下一步該怎麼辦？中央政治局於8月4日開會討論這個問題。毛澤東提出，「如果美帝得勝，就會得意，就會威脅我國。對朝鮮不能不幫，必須幫助，用志願軍的形式，時機當然還須選擇，我們不能不有所準備」^㉔。周恩來完全贊同毛的意見，表示：「如果美帝國主義將北朝鮮壓下去，則對和平不利，其侵略氣焰就會高漲起來。而北朝鮮要取得反侵略戰爭的勝利，一定要加上中國的幫助。我們不能不有此遠大設想。」^㉕顯然，毛、周考慮問題的重點，是如何幫助朝鮮贏得戰爭，或至少是避免戰局發生逆轉。第二天，毛澤東致電高崗，將8月底定為東北邊防軍完成參戰準備的期限：「八月內可能沒有作戰任務，但應準備於九月上旬能作戰。」^㉖

8月13日，高崗在瀋陽主持入朝參戰動員會議。他遵循毛澤東、周恩來講話的思路指出：「美國侵略朝鮮的戰爭，是它的整個侵略計劃的一部分。……如果美國侵略者佔領了朝鮮，毫無疑問，一定會準備力量，來進攻我們的東北與華北」，又自問自答道：「我們究竟是讓它打下朝鮮，……等它打到中國來的時候再去消滅它好呢？還是現在爭取主動，配合朝鮮人民軍，在國土以外，消滅敵人，保衛自己好呢？顯然地，在國土以外消滅敵人，是有利於我們，……我們必須主動地、積極地援助朝鮮人民，幫助朝鮮人民解放……」高崗還說，中國若入朝參戰，「以志願軍的名義出現，穿朝鮮服裝〔人民軍軍服〕，用朝鮮番號，打朝鮮人民軍的旗幟，主要幹部改用朝鮮名字」^㉗。

8月23日，周恩來帶着軍事參謀雷英夫一起去見毛澤東，談美軍有可能在仁川登陸的問題。周指出：「這是朝鮮戰局帶關鍵性的問題，值得重視。」毛表示這一判斷「有道理、很重要」。會後周將此事通報朝鮮和蘇聯政府，並認為朝鮮「應有應付最壞情況的準備」。周還嚴令東北邊防軍「務必在九月底前完成一切作戰準備工作，保證隨時可以出動」^㉘。26日，周主持了中央軍委會議並作報告，強調要以積極態度來對待朝鮮問題，朝鮮已經成為「目前世界鬥爭的焦點」，中國的參戰準備不僅要加緊進行，也要抓住時機：「一方面如果我們一時準備不好，幾個月不能前去，就會使朝鮮人民失望，這是不好的；另

一方面即不要讓敵人過早知道，使其早做準備，這樣就可以爭取出手即勝。」^⑳之後，周又連續召集中央軍委各部門開會，進一步落實入朝參戰的各項準備。9月3日，周主持完成了〈關於加強邊防軍的計劃〉，並上報毛澤東和劉少奇。根據這個計劃，東北邊防軍的總兵力將逐步增強到十一個軍、三十六個師，分為三線部署，兵員總數則將達到七十萬人^㉑。

從他們同朝、蘇方面交涉並一再提出的建議和警告來看，他們的設想是，中國部隊入朝後並不直接投入前線作戰，而是幫助朝鮮加強後方及海岸線的防衛，讓朝鮮能夠集中全力贏得戰爭，至少也要防止戰爭形勢發生扭轉。當時，黨內高層對此並無意見分歧。

在大力推進參戰準備的同時，中共領導層以「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為中心口號，發起了「偉大的抗美援朝運動」，並採用一切手段在中國民眾（尤其是知識份子）中激起「仇視、鄙視、蔑視美帝國主義」的情緒和氛圍。中共中央還決定，在全國範圍內開展旨在鎮壓「反革命份子」和「反革命活動」的運動，並逐步將之推向高潮^㉒。這一切表明，中共領導層對朝鮮危機的應對實質上是綜合性的。在毛澤東看來，中國的安全利益將通過保障中朝邊境的安全，提高中共在國內的權威和信譽，以及使新中國在國際上（尤其是在東方）的威望和影響不斷上升來實現。

可是，中國軍隊並沒有在人民軍仍處於攻勢時入朝參戰。從現有材料看，這主要是因為金日成對於引入中國軍隊助戰表現猶豫，而斯大林出於種種擔心，更不願意對此開「綠燈」。7月上旬起，金曾幾次就中國出兵問題探尋莫斯科的意見，但莫斯科要麼明確反對，要麼根本不作回答^㉓。毛澤東、周恩來一再提醒金，在人民軍的主力部隊集中於朝鮮半島最南端卻又久攻不下的情況下，需要防止敵軍在自己後方兩翼實行登陸作戰的行動。他們甚至幾次提到仁川是特別值得注意的一個點。然而，朝方卻沒有反應^㉔。同時，儘管周向朝鮮派出了軍事觀察小組，但金卻讓他們留在平壤，沒有及時提供有關前線戰事發展的情報^㉕。在沒有來自朝方的邀請和得到斯大林支持的情況下，中國出兵朝鮮是不可想像的。

三 北京作出出兵決定

9月15日，聯軍在仁川登陸，隨後又迅速將朝鮮半島上人民軍部隊分割成兩半，並乘人民軍後方空虛之際，大舉向北推進，朝鮮戰局逆轉。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認為必須盡快採取行動，阻止戰局進一步惡化。18日，周緊急召見羅申，開門見山地提出，中方幾乎得不到朝方的軍事情報，因而對戰局發展缺乏了解。他以毛的名義，請求蘇方提供關於朝鮮戰局的準確情報，還提出此時西方國家很怕蘇聯和中國參與朝鮮戰爭，「應當利用這種恐懼心理採取能夠表明我們意圖的步驟」。這顯然是在試探莫斯科的反應^㉖。第二天，周召見李周淵，重複了他前一天同羅申談話的內容後，又直截了當地問李，「朝鮮政府下一步對中國政府有甚麼要求」^㉗。9月20日，周通過中國駐朝大使倪志亮致信金日成，要求朝方準備長期作戰，千萬不要孤注一擲^㉘。

其中的潛台詞應是要求朝方不要把自己的力量過早耗盡，這樣才好等待中國支援的到來。

但是，在請中國出兵這件事上，朝鮮其實做不了主。關鍵在於，斯大林仍然不肯鬆口。當朝方探詢是否可以請中國幫忙時，莫斯科依然是不加理睬。兩周過去了，人民軍節節敗退，中方卻無法採取任何進一步的行動^{④②}。9月29日，敵軍迫近三八線，人民軍的抵抗已陷於瓦解。金日成、朝鮮外務相朴憲永再次致電斯大林，直接向蘇聯求援。30日，韓國軍隊越過了三八線，斯大林終於鬆口，讓金向中國求援。10月1日，金正式向毛澤東提出了請中國出兵支援的請求。斯大林也致電毛，強調若無外部支援，朝鮮在漢城地區以至三八線的軍隊就會崩潰，因此，中國有必要出兵援朝^{④③}。

毛澤東的反應迅速。當天晚上，他召集周恩來等幾位中共領導人在天安門城樓上碰頭，討論朝鮮局勢並談到出兵問題，但未做出正式決定，此事要在第二天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再作討論^{④④}。但毛已等不及，便連夜親自動筆起草了一份給斯大林的電報，開篇指出中共領導層已決定「用志願軍名義派一部分軍隊至朝鮮境內和美國及其走狗李承晚的軍隊作戰，援助朝鮮同志」。他解釋道，朝鮮問題的解決不僅同朝鮮革命和整個東方的命運攸關，也將對中國國內政治形勢產生重大影響；中國若出兵就必須達成「在朝鮮境內殲滅和驅逐美國及其他國家的侵略軍」的目標，故此他要求斯大林澄清，中國出兵時「蘇聯是否可以給我們以武器援助，是否可以向朝鮮出動支援空軍，並在美國空軍轟炸北京、天津、瀋陽、上海、南京等處的時候，是否可以使用大批空軍幫助我們防禦上述諸地」。電報稿中極為關鍵的是下面這段話：「既然中國軍隊在朝鮮境內和美國軍隊打起來（雖然我們用的是志願軍的名義），就要準備美國宣布和中國進入戰爭狀態，就要準備美國至少可能使用其空軍轟炸中國許多大城市及工業基地，使用其海軍攻擊沿海地帶。」^{④⑤}

如果同中共領導層在7、8月間派遣志願軍入朝時的設想相比較，毛澤東此時對入朝參戰及其後果的看法有了重大變化。兩個月前的計劃提出，志願軍入朝後將以人民軍的身份參戰，主要起到保衛後方和側翼的作用，因此不大可能導致中美之間的全面戰爭。而在這份電報稿中，他卻設想中國參戰後不僅將同美國軍隊直接開戰，甚至會導致美國進攻中國本土的一場全面戰爭。但毛顯然認為，即便如此，中國仍然應當參戰。毛的這些想法，引起了黨內其他領導人的強烈反彈。10月2日下午3時，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參戰問題，對中國是否應冒同美國發生全面戰爭、甚至「引火燒身」之險入朝參戰，會場上出現了一片保留乃至反對的聲音。毛後來說，當時支持出兵的只有「一個半人，我一個，恩來半個」^{④⑥}。在此情況下，會後毛只好把已經起草好的電報稿放在一邊，接見了羅申，請他轉告斯大林，由於中國入朝參戰「會造成極為嚴重的後果」，包括「引起美國與中國之間的公開衝突」，因此在入朝參戰上「中共中央的許多同志認為，對此必須謹慎行事」，中共領導層「對此問題尚未做出最後決定」^{④⑦}。

就在毛澤東會見羅申的幾乎同時，周恩來於10月3日清晨0時10分召見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 (Kavalam M. Panikkar)，要求他向美國政府傳遞下列信息：「美國軍隊正企圖越過三八線，擴大戰爭。美國軍隊果真如此做的話，我

們要管。」周發出的是一個極為重要的信息。事前他作了充分的準備，據周的英語翻譯浦壽昌回憶，周對於在信息中使用的措辭頗費躊躇，特地找浦商量，用甚麼英語詞彙表達「我們要管」的「管」字。周恩來最後拍板，決定使用“intervene”（干預）一詞^{④6}。

周恩來為甚麼在此刻發出這樣的信息？許多中外研究者認為，這是為了阻止美軍越過三八線向北推進。但問題在於，很難設想中共領導層在敵軍實際上已經越過三八線、而朝方的抵抗已經崩潰的情況下，會幼稚地認為，僅僅通過這一信息便能夠使得敵軍停止前進。從領導層關於出兵與否的討論已處於關鍵時刻的情況來看，或許可以這樣認為：周此時發出信息，是為了達到戰術與戰略層面的兩個重要目標：如果這一信息起到了威懾敵方的作用，就能延緩敵軍向北推進，並為中方爭取到出兵準備所需的寶貴時間與空間；如果華盛頓無視北京的警告而繼續將戰火引向中朝邊境，就有充分的理由向全中國乃至全世界宣告，中國出兵朝鮮打的是一場師出有名的正義之戰。

關鍵在於，毛澤東的出兵決心並未改變。同時，在中國是否參戰的問題上，儘管黨內多數領導人表達了保留乃至反對的意見，卻從未形成一個組織上的「反對派」。中央政治局會議結束後，毛也有所行動，立即讓周恩來派專機前往西安，接彭德懷來京開會。這是他推動中共領導層朝着出兵方向走出的另一個關鍵步驟。10月4日下午3時，中央政治局繼續開會。毛先讓不同意出兵的各種意見一概說出來，彭在下午4時才乘專機到達北京西郊機場，趕赴中南海會場後只聽了會議的後半部分，沒有發言。周已經知道毛的心思，在會上也沒有講話。第二天上午9時，毛先讓鄧小平去北京飯店接彭，向彭交了底，把出兵和讓彭出任統帥的意思轉達給他。下午開會前，毛又在中南海親自同彭交談，講明了出兵意圖：「我們要盡快出兵，爭取主動。今天下午政治局繼續開會，請你擺擺你的看法。」彭當即表示，擁護出兵援朝^{④7}。會議繼續舉行時，彭果然大聲疾呼道，「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爛了，等於解放戰爭晚勝利幾年」。他還表示同意出任中國入朝參戰部隊的主帥。周也在會上表態，「堅決支持毛澤東出兵援朝的主張」。如此一來，會議的風向轉變了，最後領導層同意做出入朝參戰的決策^{④8}。

10月6日，周恩來召集黨政高級幹部開會，傳達並落實中央的出兵決定。他重申自己支持出兵的態度：「現在朝鮮政府一再要求我們出兵援助，我們怎能見死不救呢？黨中央、毛主席決心已定，因此現在不是考慮出不出兵的問題，而是考慮出兵後如何去爭取勝利的問題。」^{④9}8日，毛澤東正式發布了出兵命令，並將中國出兵的決定通知了金日成^{⑤0}。

四 出兵決定終成定局

就在出兵命令發布的當天，毛澤東還通過蘇聯使館通知斯大林，中共中央已決定出兵，「周恩來和林彪同志已於今日晨8點前往您的所在地」^{⑤1}。周恩來此行任務艱鉅，要當面向斯大林解釋，中共領導層作出出兵決定是不容易

的，也會面臨種種難以預想的困難，從而落實「中國出陸軍、蘇聯出空軍」的安排、蘇聯對中國沿海地區的空防，以及對中國的大規模軍援。當天，周離開北京飛往蘇聯，10月10日到達莫斯科。斯大林當時正在黑海之濱休假，於是，周又同前往蘇聯治病的林彪一道，馬不停蹄地前往斯大林所在地。11日，周和林同斯大林會晤，這恐怕是周一生中最為困難的會談之一。出乎預料的是，之前一直催促中國出兵的斯大林，卻在中共領導層決定出兵後，在蘇聯是否出動空軍入朝參戰上退縮了。他雖然承諾蘇聯將向中國提供必要的軍事物資援助，卻又表示蘇聯空軍不能和中國軍隊同時入朝參戰，提供空中掩護^{⑤2}。

斯大林之所想，應是要避免捲入同美國的直接軍事對抗，但這卻給周恩來出了一個大難題。他當然不能自作主張地告訴斯大林，即便沒有蘇聯的空軍支援，中國仍然會參戰。在情急之下，他隨機應變，和斯大林討論起中國在不出兵的情況下的各種對策。當時擔任翻譯的師哲後來對筆者說，周恩來這麼做其實是在「玩」（戲弄）斯大林^{⑤3}。同時，周還一反慣例地提出，由他和斯大林聯名給毛澤東發電報，以報告會談的情況。斯大林生平從未與別的國家或黨的領導人聯名發送電報通報自己與對方代表的會談情況，但鑒於這次會談所涉及問題的特殊性和緊迫性，他居然同意了。電報指出，蘇聯空軍至少要兩個月以後「才能到位」，而為準備入朝參戰的中國部隊提供裝備和培訓，則「至少要六個月的時間」^{⑤4}。

10月12日，毛澤東收到這份聯名電報後，當即命令東北各部隊「仍就原地進行整訓，不要出動」，同時通知斯大林，「已命令中國軍隊停止執行進入朝鮮的計劃」^{⑤5}。但是，從他隨後採取的行動來看，他出兵的決心並沒有動搖。第二天，他主持中央政治局再次開會討論參戰問題，經「反覆比較利弊得失」，還是達成了「我軍還是出動到朝鮮為有利」的結論。會後，毛馬上致電還在莫斯科的周恩來，請他立即通知斯大林，中國維持出兵朝鮮的決定。毛強調^{⑤6}：

我們採取上述積極政策〔入朝參戰〕，對中國，對朝鮮，對東方，對世界都極為有利；而我們不出兵，讓敵人壓至鴨綠江邊，國內國際反動氣焰增高，則對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對東北更不利，整個東北邊防軍將被吸住，南滿〔瀋陽至大連鐵路線以東地區〕電力將被控制。

總之，我們認為應當參戰，必須參戰，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

同時，毛還指示周繼續同蘇聯領導人進行磋商，澄清蘇聯對中國提供軍援及空軍支援問題的種種細節，確定「蘇可以完全滿足我們的飛機、大炮、坦克等項裝備」，並允許中國以「租借辦法而不是出錢買」這些裝備。毛還特別要求周同斯大林確定，蘇聯空軍並非肯定不能入朝參戰，只是還需要一段準備時間：「只要蘇聯能於兩個月或兩個半月內出動志願空軍幫助我們在朝鮮作戰外，又能出動掩護空軍到京、津、瀋、滬、寧、青等地，則我們也不怕整個

的空襲，只是在兩個月或兩個半月內如遇美軍空襲則要忍受一些損失。」毛指示周「留在莫斯科幾天，和蘇聯同志重新商定上述問題」^{⑤7}。

朝鮮戰場上形勢瞬息萬變。10月14日，毛澤東在給周恩來的兩份電報中，分析了戰局發展的兩種可能性，並提出了迎頭痛擊敵軍或先取守勢的兩種設想。第一種設想是：美軍一聯軍佔領平壤等地後繼續向北推進，入朝參戰的中國部隊給予堅決打擊，「如敵來攻則在陣地前面分割殲滅之，如平壤美軍元山偽軍兩路來攻則打孤立較薄之一路」。第二種設想是：美軍一聯軍佔領平壤、元山後在六個月內固守不出，「則我軍亦不去打平壤、元山」，而是「構築兩道至三道防禦陣線」，「在我軍裝備訓練完畢，空中和地上均對敵軍具有壓倒的優勢條件後，再去攻擊平壤、元山等處，即在六個月以後再談攻擊問題」^{⑤8}。

顯然，上述第二種設想是毛澤東針對敵軍在佔領平壤、德川、元山一線後固守不出的特定情況而提出的。對匆忙入朝參戰的中國軍隊來說，在蘇聯提供的重型武器裝備尚未抵達、又完全沒有空中掩護的條件下，當然不能對擁有裝備優勢、又持固守不出態勢的敵軍貿然發起正面攻擊。毛熟諳兵法，才有上述設想。韓國學者金東吉在《外交史》(*Diplomatic History*)雜誌上發表的一篇論文裏，以毛在這兩份電報中對戰場形勢的第二種設想為依據，使用了「出而不戰」一詞來概述這一設想，並將之誇大及上升為中共領導層之所以會做出入朝參戰決定的基本考慮和前提條件，以及準備在中國軍隊入朝後採取的基本戰略^{⑤9}。這一看法固然新穎，亦可以說是一家之言，但卻同相關史料脫節，因而是站不住腳的。實際上，就在毛發出這兩份電報後幾天之內，隨着朝鮮戰局的迅速變化，尤其是在敵軍並未停留在平壤、德川、元山一線，而是繼續向北推進的情況下，敵變我變，毛迅速決定，根據上述第一種設想，採取了主動出擊，在大規模運動戰中消滅敵軍，伺機展開全面反擊的作戰方針，並付諸實施。

10月21日凌晨2時半，毛澤東根據韓國軍隊的幾個師正來勢洶洶地向北推進的情況，明確地指示彭德懷：「此次是殲滅偽軍三幾個師爭取出國第一個勝仗，開始轉變朝鮮戰局的極好機會。……望鼓勵全軍，不惜犧牲，不怕艱苦，爭取全勝。」不到一小時，毛又在致彭德懷、高崗等人的另一份電報中明確地提出：「現在是爭取戰機問題，是在幾天之內完成戰役部署以便幾天之後開始作戰的問題，而不是現有一個時期部署防禦然後再談攻擊的問題。」^{⑥0}

與此同時，周恩來在莫斯科接到毛澤東10月14日的電報指示後，立即致信斯大林並繼續同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交涉，以敦促蘇聯落實對中國本土空防的承諾，兌現蘇聯對中國的軍援，並澄清蘇聯出動志願空軍入朝作戰的問題。莫洛托夫表示，蘇方將在中國出兵時提供軍事裝備，並「派空軍到中國幫助防空和訓練」，但「不得越出中國國境」^{⑥1}。周立即就此向毛作出報告。17日，周回到北京。為了當面聽取周的匯報，毛又一次命令部隊暫緩入朝的行動^{⑥2}。毛在聽取周匯報情況後得悉，蘇聯將向中國提供各種軍事援助，包括為中國各大城市提供空防援助，並仍有可能在兩個月後派出空軍掩護中國入朝部隊的地面作戰，隨即表示志願軍「按預定計劃進入朝北作戰」。18日，毛發布了志願軍跨過鴨綠江的最後命令^{⑥3}。

五 從戰場上爭取全勝到走向談判桌

中國參戰後，很快便扭轉了朝鮮戰局。10月25日，志願軍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在雲山地區對韓國部隊發起突襲。不到兩周，敵軍被迫從鴨綠江附近地區後退到長津湖一線。從11月1日開始，根據斯大林的命令，以安東為基地的蘇聯空軍部隊也提前投入了保衛鴨綠江上空入朝交通線的作戰行動⁶⁹。此後，中國軍隊似乎消失了一般，其實是在朝鮮北部山地布下了「口袋陣」。時任美軍一聯軍統帥的麥克亞瑟 (Douglas MacArthur) 將軍在敵情不明的情況下，於11月中旬宣布發起一場「以徹底結束戰爭」為目標的「最後攻勢」，美軍因此落入了志願軍早已設好的包圍圈。從25日起，志願軍開始了強有力的反攻，到12月中旬已基本克復了朝鮮北部的幾乎所有失地。

戰場上的勝利，使得中朝方面當時若通過談判來結束戰爭，將處於十分有利的地位。12月5日，印度等十三個非西方國家提出一項和平方案，建議中國軍隊在三八線停止進攻，並在此基礎上召開對朝鮮問題的大國會議，以討論最終解決朝鮮危機的方案。14日，聯合國大會通過十三國提案，並成立了一個探求在朝鮮實現令人滿意的停火基礎，由伊朗駐聯合國代表安迪讓 (Nasrollah Entezam)、加拿大駐聯合國代表皮爾遜 (Lester B. Pearson)、印度駐聯合國代表勞 (Benegal N. Rau) 組成的三人委員會。印度等國不斷向北京保證，十三國提案決非由西方國家所策劃，並會將中國的其他利益 (包括台灣問題) 考慮在內⁷⁰。

然而，毛澤東卻堅持參戰之初所制定的「消滅敵人，首先是全殲偽軍」、以戰勝美國和「美帝撤兵」為結果的目標；他在12月3日對金日成表示，若敵方要求停戰，「我們認為必須敵人承認撤出朝鮮，而首先撤至三八線以南，才能談判停戰」⁷¹。周恩來在外交活動中也積極貫徹毛在朝鮮爭取全勝的意圖。8日，他指示外交部亞洲司副司長陳家康在與印度代表會面時質問，為甚麼十三國不在美軍一聯軍越過三八線時提出停火建議，卻在中朝聯軍向前挺進時提出這樣的建議？12日，周在約見潘尼迦時指出，由於三八線已經被美方所打破，中方也沒有必要再去尊重它⁷²。21日，毛命令彭德懷「越過三八線再打一仗」⁷³。第二天，周正式拒絕了十三國提案，指責這不過「是為着美國可以取得喘息時間，準備再戰」的陰謀⁷⁴。

1950年最後一天，中國軍隊發起了新攻勢，於1951年1月4日佔領漢城 (今首爾)。8日，中朝聯軍先頭部隊抵達了北緯三十七度線 (三七線) 一線。在中國軍隊已將戰線大大向南推進的情況下，從10日起，蘇聯空軍出動兩個師，進一步掩護並支持中朝地面部隊 (包括保衛朝鮮北部的交通運輸線及後勤供給網絡) 的作戰行動⁷⁵。11日，三人委員會提出了解決朝鮮衝突的五項原則，建議交戰雙方立即停火，外國軍隊逐步撤離朝鮮，然後再召開由蘇聯、美國、英國和中國等四大國參加的國際會議，商討解決包括台灣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聯合國席位爭端在內的「各項遠東問題」⁷⁶。

從戰局後來的發展來看，這是中朝方面結束戰爭的一個絕佳機會。當時志願軍經過連續作戰，亟需休整，再加上缺乏空中掩護，補給線又拉得太長，攻勢已是強弩之末。彭德懷擔心己方後方和側翼暴露，下令部隊停止進攻，

鞏固陣地^㉔。中朝方面若接受三人委員會的停火建議，可以讓志願軍鞏固新佔領地區，即便停火失敗，也能使部隊獲得寶貴的休整機會。更要緊的是，中朝方面如果接受停火建議，還會使得美國處於進退兩難的窘境。當時的美國決策者其實並不同意停火建議的主要內容，但還是在聯合國大會上投了贊成票。時任美國國務卿艾奇遜(Dean G. Acheson)後來解釋道，美國若是不支持該建議，就會導致失去聯合國多數成員國的支持；美國之所以投贊成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斷定中國必定反對。這是美國決策者的一場賭博^㉕。

中朝方面若是接受這一議案，除了戰場上的收益外，還會在國際外交上開創有利局面。然而，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的思維完全被戰場上的勝利所帶來的「優勢意識」所主導，一心要乘勝追擊，在朝鮮戰場上爭取全勝。他們由於缺乏對於國際事務的透徹了解，認為三人委員會「先停戰後談判」的意見有利於美國，「因為只要先停戰，美國就有可能保存實力並使李承晚保有若干地區和武裝資本，而談判則可無限期地拖延下去」，因而「我們擬拒絕先停戰後談判」^㉖。1月17日，周恩來在對三人委員會停火建議的回應中指出，該議案偏向美國，因而不能接受。他提出的談判條件是：在中國召開中、蘇、英、美、法、印度和埃及七大國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中國代表獲得在聯合國及其安全理事會的席位，所有外國軍隊立即撤出朝鮮和台灣。潘尼迦同周談話時其實已提到，「據印度政府了解，美國政府之所以同意這一建議，是因為它預料中國政府會拒絕這一建議」。然而，中方並未對此給予充分重視^㉗。三人委員會的努力擱淺了。

事後看來，這是中共領導層的一次重大的誤判和失策。此後，不僅朝鮮戰爭又打了兩年多，也造成新中國在國際社會的進一步孤立。尤其產生長遠消極影響的是，在此後《對日和平條約》(即《舊金山和約》)談判及簽訂的過程中，中國完全被排除在外。第二天，周恩來覺察到情況不妙後，曾表示願意考慮三人委員會的停火建議，試圖挽回局面，但已經太遲了。1月22日，中國外交部以答覆潘尼迦的方式，提出修正方案：在所有外國軍隊從朝鮮撤出的原則被接受並開始實施後，即可先實行有限期的停火，再聯繫政治問題確定談判的全部條件^㉘。但美國對此未予理睬。

中共領導層何以會出現這麼嚴重的失算？固然同他們對形勢過於樂觀的判斷是分不開的，但更深入地看，其中恐怕有着中共在國內展開全面的社會整合和動員的深層次原因。中國參戰後，正如毛澤東所期待，新的愛國主義浪潮席捲中國社會。「抗美援朝」的全面推進很快便超越了「保家衛國」的宣傳重點，而進入了強調在中共領導下建設強大而自豪的新中國的新階段。毛澤東、周恩來等人清楚地意識到，志願軍在朝鮮戰場上繼續獲勝，將促使運動進一步發展下去。2月2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號召全黨全國更加廣泛深入地開展「抗美援朝愛國運動」，以此來響應志願軍在朝鮮戰場所取得的「前線勝利」。通知提出，要「開展蔑視、鄙視、仇視美國帝國主義與提高民族自尊心自尊心的運動」，並通過普遍訂立「愛國公約」，使得中國人民從靈魂深處「擁護毛主席，擁護人民政府，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㉙。2月中旬，毛、周參加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強調，抗美援朝運動「已推行者深入之，未推行者普及之，務使全國每處每人都受到這種教育」^㉚。

可是，志願軍在朝鮮戰場上並不具備乘勝追擊的實力。1月25日，美軍一聯軍開始反攻。27日，彭德懷向毛澤東提出暫時撤退、鞏固戰果的建議。但毛在回電中卻命令志願軍以進攻回擊美軍的進攻，甚至認為志願軍可以一直打到三七線以南⁷⁹。然而，美軍很快就擊退了志願軍，並趁機進一步反攻，使志願軍處於極為被動的局面。2月下旬，彭專程趕回北京，當面向毛報告戰場情況，提出志願軍應當採取守勢，並輪換前線部隊，加強空中掩護，為春季大反攻做準備⁸⁰。根據彭的報告，毛對朝鮮戰場應採取戰略的看法開始出現轉變。周恩來受毛委託，起草了中央軍委關於在朝鮮戰場輪番作戰部署的指示。而後毛又親自致電斯大林通報這一新戰略，毛仍然相信，志願軍有能力通過在戰場上不斷消滅敵軍有生力量，最終把美軍驅逐出朝鮮半島⁸¹。

經過兩個多月的準備後，中朝聯軍在朝鮮戰場上集結了百萬大軍，於4月下旬發動第五次戰役。然而，在缺乏空中掩護和持續及可靠的後勤支援的條件下，這次戰役沒有達到使戰線大幅度南移的目標。在戰役最後階段，過於深入敵陣的部分志願軍部隊因為撤退不及而陷敵重圍，其中180師幾乎全軍覆沒⁸²。此後毛澤東開始重新考慮朝鮮戰場的目標。他終於認識到，志願軍的實力與中共領導層雄心勃勃的戰爭目標之間存在着很大差距，轉而願意考慮在軍事上未能獲得全勝的情況下結束戰爭。從5月下旬起，中共領導層和軍方根據毛的指示，對在朝鮮的戰略作了一次全面評估。據當時任代總參謀長的聶榮臻後來回憶道，在中央討論過程中，「多數同志主張我軍宜停在三八線附近，邊打邊談，爭取談判解決問題。……把敵人趕出朝鮮北部的政治目的已經達到，停在三八線，也就是恢復戰前狀態，這樣各方面都好接受」⁸³。毛的主要考慮集中在停戰對國內形勢和國際格局的可能影響上。他和其他中共領導人認識到，志願軍把美軍從鴨綠江邊趕回到三八線附近，已足以證明中國在抗美援朝中取得勝利。因此，舉行停戰談判的時機到來了。

六 餘論：參戰對中國意味着甚麼？

1951年7月10日，停戰談判先在開城、後又轉至板門店舉行。當時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曾認為，停戰協議在幾星期內就可以達成。然而，談判的過程比他們的想像要複雜得多。經過近半年「邊談邊打」的反覆較量，雙方才在劃定軍事分界線及停戰安排上獲得進展，並於1952年2月19日達成協議，在停戰協議簽字後九十天之內召開相關國家參加的政治會議討論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然而，他們很快又發現，本認為最容易解決的戰俘遣返問題，成了談判時幾乎難以逾越的障礙。這個問題的談判於1951年12月11日開始後，美軍一聯軍方面提出，戰俘遣返應在自願遣返 (voluntary repatriation) 基礎上進行 (這樣大批中朝戰俘將不會被遣返)。毛和他的同志意識到，美國的目的是在談判桌上獲得戰場未能取得的政治優勢，而戰俘遣返關係到中國出兵朝鮮是否「師出有名」的重大政治問題，因而不能讓步。他們決心同美國進行在政治和軍事上針鋒相對的鬥爭，慘烈的戰爭仍要打下去。

轉折點發生在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蘇聯新領導層在結束朝鮮戰爭的問題上有了新的想法。7日，周恩來到達莫斯科，參加斯大林葬禮，之後又赴布拉格參加捷克斯洛伐克總統哥特瓦爾德(Klement Gottwald)葬禮，於21日重返莫斯科。當晚，周同馬林科夫(Georgi Malenkov)、赫魯曉夫(Nikita S. Khrushchev)、貝利亞(Lavrentiy P. Beria)、莫洛托夫和布爾加寧(Nikolay A. Bulganin)等蘇聯領導人會晤，他們明確提出：「過去拖的路線應改為停的路線，不改是不正確的。因為拖下去，不利於蘇聯和中朝人民；停下來，有利於蘇聯和中朝人民。目前是解決停戰的有利時機。」⁶⁴會後周立即致電毛澤東，轉達蘇方意見⁶⁵。22日，毛覆電「同意〔蘇方〕所提方針」⁶⁶。周立即將中方答覆轉告蘇聯領導人。通過談判走向停戰的大門終於打開了。7月27日，在停戰談判開始兩年之後，交戰雙方終於在板門店簽訂了停戰協議。

回過頭去看，中國參加朝鮮戰爭付出的代價是巨大的。戰場上，數十萬計的中國士兵失去了生命；台海局勢的發展變得更加複雜，兩岸之間的持久分裂已成定勢；在中蘇同盟得到加強的同時，中國對於蘇聯在經濟上和其他方面的依賴也大大加強（這又成為導致中蘇後來走向分裂的一個重要因素）；中美之間的全面對抗進一步升級；面對中國在國際安全環境方面的巨大壓力，中共領導層在對各種資源的配置中，將國防和重工業放到空前重要的位置，並順理成章地採納了以高度集中為標誌的統制性計劃經濟模式，從而成為整個毛澤東時代中國經濟持續陷入「短缺型經濟」形態的邏輯出發點。

然而，毛澤東對參戰的得失有自己的看法。中國軍隊既然將美軍一聯軍從鴨綠江邊趕回到三八線附近，這就足以使得中共領導層能夠理直氣壯地宣布，新中國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取得了輝煌的勝利。從毛的視角來看，不管中國參加朝鮮戰爭的代價有多大，都不能同其收益相提並論。中國入朝參戰前後，國內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抗美援朝運動，帶動了以愛國主義和革命民族主義為主旋律的廣泛群眾動員，並由此進一步促成了中國政治與社會的一系列革命性變化，尤其是包括鎮壓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反」、「五反」以及思想改造在內的各種運動席捲全國城鄉。中共的政策、組織和聲望也隨之滲入中國社會的每一個細胞，有效地加強了對於國家和社會的組織性控制。劉少奇的一段話很能說明問題⁶⁷：

抗美援朝很有好處，使我們的很多事情都好辦（如搞土改、訂愛國公約、搞生產競賽、鎮反等）。因為抗美援朝的鑼鼓響起來，響得很厲害，土改的鑼鼓、鎮反的鑼鼓就不大聽見了，就好搞了。如果沒有抗美援朝的鑼鼓響得那麼厲害，……「很多事情不好辦」。

從歷史的長遠眼光來看，朝鮮戰爭的結束把中國的發展帶到一個重要的分岔路口。中共領導層的選擇，是借抗美援朝「偉大勝利」之東風，讓中國在毛澤東想像和計劃中的「繼續革命」道路上走下去。戰後關於中國入朝參戰的歷史敘事，一直同中共在各個不同時期對社會的改造和政治動員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成為激發普通中國人愛國主義情懷以及對於國家政策「內在支持」的一個持久不衰的源泉。毛本人作為參戰決策的主要推動者，在黨內的威望大

增，其個人本已極大的政治權力，也帶上比先前更少受到制衡並更具有個人獨斷的特徵。這一切，一旦時機成熟，就有可能進一步膨脹爆發。此後十餘年間，毛果然把空前宏偉的烏托邦願景和空前巨大且不受制約的政治權力結合起來，推出了諸如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之類以改造中國的國家和社會乃至人及人心為目標，卻造成了災難性後果的「大動作」。所有這一切，若沒有包括抗美援朝之類的革命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敘事的加持，恐怕是難以想像的。

註釋

① Chen Jian,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② Chen Jian, "China's Strategies to End the Korean War", i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85-117; 陳兼：〈六十年後再思考：朝鮮戰爭的起源和歷史影響〉，《文史參考》，2010年第12期，頁124-27；Chen Jian, "Far Short of a 'Glorious Victory': Revisiting China's Changing Strategies to Manage the Korean War", *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 25, no. 1 (2018): 1-22。

③ 筆者是以英文和中文同時寫作這本傳記的。英文版書名現為 *Zhou Enlai: A Life*，將由哈佛大學出版社於2024年春季出版。

④ 〈什特科夫關於金日成通報金一在北平談判情況致維辛斯基電〉（1949年5月15日）、〈科瓦廖夫關於毛澤東通報與金一會談的情況致史達林電〉（1949年5月18日），載沈志華編：《朝鮮戰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上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頁187-88、189-90。

⑤ Chen Jian,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158-89；金東吉：〈中國人民解放軍中的朝鮮師回朝鮮問題新探〉，《歷史研究》，2006年第6期，頁112。

⑥ 〈莫洛托夫呈報的擬答覆金日成的指示稿〉（1949年9月23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關於答覆什特科夫請示的決議〉（1949年9月24日），載《朝鮮戰爭》，上冊，頁255-59、260。

⑦ 〈斯大林致毛澤東電：關於朝鮮問題的答覆〉（1949年10月26日）、〈葛羅米柯致科瓦廖夫電：轉交斯大林對朝鮮問題的答覆〉（1949年11月5日），載沈志華主編：《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第二卷（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5），頁139、153。

⑧ 〈史達林關於同意會晤金日成討論統一問題致什特科夫電〉（1950年1月30日），載《朝鮮戰爭》，上冊，頁309；〈斯大林致什特科夫電〉（1949年2月2日），АПРФ（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ф.45, оп.1, д.347, л.12。後文直接引自俄羅斯檔案，俄文原件及中譯文均由沈志華教授提供，並經陳之宏教授校讀。謹此致謝！

⑨ 〈伊格納季耶夫關於毛澤東會見李周淵的情況致維辛斯基電〉（1950年4月10日）、〈什特科夫關於金日成訪華計劃致維辛斯基電〉（1950年5月12日），載《朝鮮戰爭》，上冊，頁336、381。

⑩ 〈周恩來在軍委情報部第二局、第五局全國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50年4月1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頁249。

⑪ Sergei N. Goncharov, John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144-45.

⑫ 〈什特科夫關於金日成訪華計劃致史達林電〉、〈羅申關於金日成與毛澤東會談情況的電報〉（1950年5月13日），載《朝鮮戰爭》，上冊，頁381、383。金日成到北京前，周恩來為防止消息走漏，還讓師哲騰出中南海的住房，讓金暫住。參見筆者與師哲訪談，北京，1992年8月。

- ⑬ 〈史達林關於同意朝鮮同志建議致毛澤東電〉(1950年5月14日)，載《朝鮮戰爭》，上冊，頁384。
- ⑭ 〈粟裕在第三野戰軍傳達中央決定〉(1950年4月10日)、〈毛澤東致蘇聯斯大林《關於購買空軍裝備器材》電報〉(1950年4月11日)，轉引自蕭鴻鳴、蕭南溪、蕭江：《金門戰役紀事本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6)，頁393。
- ⑮⑯ 筆者與師哲訪談，北京，1992年8月。
- ⑰ 〈羅申致斯大林電〉(1950年5月16日)，轉引自Evgeniy P. Bajanov and Natalia Bajanova, "The Korean Conflict, 1950-1953: The Most Mysterious War of the 20th Century—Based on Secret Soviet Archiv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1998), 52-53。
- ⑱ 〈周外長發表聲明 杜魯門聲明和美海軍行動是對我武裝侵略 我全體人民必將從美侵略者手中解放台灣〉，《人民日報》，1950年6月29日，第1版。
- ⑲ 肖勁光：《肖勁光回憶錄(續集)》(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頁8、26；He Di, "'The Last Campaign to Unify China': The CCP's Unmaterialized Plan to Liberate Taiwan, 1949-1950", *Chinese Historians* 5, no. 1 (1992): 12-16。
- ⑳ 〈羅申致菲利波夫(斯大林)電〉(1950年7月2日)，АПРФ, ф.45, оп.1, д.331, л.75-78。
- ㉑ 〈史達林關於中國在中朝邊境集結部隊問題致羅申電〉(1950年7月5日)，載《朝鮮戰爭》，上冊，頁431。
- ㉒ 〈聶榮臻給毛澤東的報告，「軍委會會議討論保衛國防支援朝鮮戰爭問題的建議」〉(1950年7月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檔案館，宗卷號不明；毛澤東：〈關於同意保衛國防問題會議決議事項給聶榮臻的信〉(1950年7月7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頁428。
- ㉓ 〈周恩來致高崗電〉(1950年7月10日)，載《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三冊，頁24。
- ㉔ 〈周恩來給毛澤東、朱德、劉少奇的信〉(1950年7月13日)，載《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三冊，頁34。
- ㉕ 〈斯大林致什特科夫電〉(1950年7月20日)，ЦАМОРФ(俄羅斯聯邦國防部檔案館)，ф.5, оп.918795, д.122, л.352-55；《周恩來軍事活動紀事》編寫組：《周恩來軍事活動紀事，1918-1975》，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頁13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55。
- ㉖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電〉(1950年7月15日)，ЦАМОРФ, ф.5, оп.918795, д.122, л.303-305。
- ㉗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頁168。
- ㉘⑳㉙㉚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頁62；67；80；84。
- ㉛ 〈軍委關於東北邊防軍月內完成一切作戰準備給高崗的電報〉(1950年8月5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頁454。
- ㉜ 〈高崗在瀋陽軍事會議上的講話〉(1950年8月13日)，轉引自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戰爭史》，第一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頁91-92。
- ㉝ 周恩來：〈充分準備，出手即勝〉(1950年8月26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周恩來軍事文選》，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頁44、46-47。
- ㉞ 周恩來：〈關於加強東北邊防軍問題給毛澤東、劉少奇的報告〉(1950年9月3日)，載《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三冊，頁247-48。
- ㉟ 參見〈怎樣認識美國(宣傳提綱)〉(1950年11月5日)，載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宣傳部編：《偉大的抗美援朝運動》(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頁674-84；〈政務院、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1950年7月23日)，載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頁358-60。

⑳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電〉（1950年7月15日）、〈斯大林致什特科夫電〉（1950年7月20日），ЦАМОРФ, ф.5, оп.918795, д.122, л.303-305, 352-55。

㉑ 〈毛澤東致斯大林的電報〉（1950年10月2日），手稿複印件；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113。

㉒ 柴成文、趙勇田：《板門店談判》（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頁34-38、52-53、69-70。

㉓ 〈葛羅米柯關於對周恩來的答覆致羅申電〉（1950年9月20日），載《朝鮮戰爭》，中冊，頁542；《抗美援朝戰爭史》，第一卷，頁124。

㉔ 〈羅申致斯大林電〉（1950年9月21日），АПРФ, ф.45, оп.1, д.331, л.131。

㉕ 〈羅申致斯大林電〉（1950年9月21日）、〈羅申致斯大林電〉（1950年9月22日），АПРФ, ф.45, оп.1, д.331, л.131, 133-35；〈什特科夫致葛羅米柯電〉（1950年9月21日），ЦАМОРФ, ф.5, оп.918795, д.125, л.86-88。

㉖ 〈什特科夫關於轉呈金日成、朴憲永給史達林的求援信致葛羅米柯電〉（1950年9月30日）、〈史達林關於建議中國派部隊援助朝鮮問題致羅申電〉（1950年10月1日），載《朝鮮戰爭》，中冊，頁563-65、571；〈金日成、朴憲永致毛澤東信〉（1950年10月1日），載《抗美援朝戰爭史》，第一卷，頁148-49。

㉗ 關於這次碰頭，沒有看到直接的資料，唯一可以依靠的是楊尚昆1984年接受《彭德懷傳》編寫組訪談時的回憶，但楊的說法後來又有改變。參見筆者與《彭德懷傳》編寫組成員張希、王亞志訪談，北京，1992年8月。

㉘ 毛澤東：〈關於決定派軍隊入朝作戰給斯大林的電報〉（1950年10月2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頁539-40。以上引文中要求斯大林提供空軍支援的部分，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發行版本中被刪去，這裏引用的段落係根據由中央檔案館提供的毛澤東手稿複印件。

㉙ 〈羅申轉呈毛澤東關於中國暫不出兵的意見致史達林電〉（1950年10月3日），載《朝鮮戰爭》，中冊，頁576-77。值得注意的是，若同毛起草的10月那封未發出的電報相比較，他講到出兵理由時，談的都是自己的看法；而在談到不宜出兵時，引的都是其他中共領導人的意見。

㉚ 〈周恩來同潘尼迦的談話〉（1950年10月3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05-00009-01；周恩來：〈美軍如越過三八線，我們要管〉（1950年10月3日），載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頁25-27；李越然：〈我在周總理身邊工作的片斷回憶〉，載外交部外交史編輯室：《新中國外交風雲》（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0），頁97。據潘尼迦在回憶錄中對這次談話的場景和內容的記述，周說：“If the Americans crossed the 38th parallel China would be forced to intervene in Korea.” 參見K. M. Panikkar, *In Two Chinas: Memoir of a Diplomat* (London: G. Allen and Unwin, 1955), 109-10。國務院中國事務辦公室主任柯樂博 (Oliver E. Clubb) 的意見反映了美方的反應：「我們不能通過撤退或對北平的威脅妥協來避免危險：無論採取哪種行動，都會增加而非減少我們在局勢中已有的危險。」參見“Clubb to Merchant” (4 October 1950), 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以下簡稱FRUS), 1950, Korea, vol. VII, ed. John P. Glennon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6), 864-65。

㉛ 〈彭德懷秘書張養吾記事〉（1950年10月4日、1950年10月5日），列印件，張希提供；筆者與張希、王亞志訪談，北京，1992年8月；《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一卷，頁205；《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部編：《彭德懷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頁400-402；彭德懷：《彭德懷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頁25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中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頁944。

㉜ 彭德懷：《彭德懷自述》，頁258；《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頁84。

- ⑩ 毛澤東：〈關於組建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命令〉（1950年10月8日）、〈關於派遣志願軍問題給金日成的電報〉（1950年10月8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頁543-44、545。
- ⑪ 〈毛澤東經蘇聯使館致斯大林電〉（1950年10月8日），РГАСПИ（俄羅斯社會和政治史國家檔案館），ф.558, оп.11, д.334, л.132。
- ⑫ 師哲回憶，李海文整理：《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頁495-503；筆者與師哲訪談，北京，1992年8月。
- ⑬ 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頁495-503；筆者與師哲訪談，北京，1992年8月。
- ⑭ 〈斯大林、周恩來致蘇聯駐北京使館並立即轉告毛澤東的電報〉（1950年10月11日），РГАСПИ，ф.558, оп.11, д.334, л.134-35。
- ⑮ 毛澤東：〈關於十三兵團仍在原地訓練給彭德懷等的電報〉（1950年10月12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頁552；〈毛澤東致斯大林電〉（1950年10月12日），РГАСПИ，ф.558, оп.11, д.334, л.141。
- ⑯ 毛澤東：〈關於我軍應當入朝參戰給周恩來的電報〉（1950年10月13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頁556。
- ⑰ 毛澤東：〈中國人民志願軍應當和必須入朝參戰〉（1950年10月13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頁103-104。
- ⑱ 毛澤東：〈關於朝鮮情況和我軍入朝參戰意見給周恩來的電報〉（1950年10月14日）、〈關於志願軍入朝作戰的方針和部署給周恩來的電報〉（1950年10月14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頁558-59、560-61。
- ⑲ Kim Donggil, "China's Intervention in the Korean War Revisited", *Diplomatic History* 40, no. 5 (2016): 1002-26.
- ⑳ 毛澤東：〈爭取戰機迅速完成戰役部署〉（1950年10月21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上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頁270。
- ㉑ 〈周恩來致斯大林信〉（1950年10月14日），載《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三冊，頁404-40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62；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頁501-502。
- ㉒ 毛澤東：〈關於志願軍先頭部隊出動時間給彭德懷、高崗等的電報〉（1950年10月17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頁567。
- ㉓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一卷，頁216；毛澤東：〈關於志願軍按預定計劃入朝作戰給鄧華等的電報〉（1950年10月18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頁567-68。
- ㉔ 10月29日，蘇聯駐中國總顧問沙哈諾夫（Andrei Sakharov）告知周恩來：「蘇方已同意派蘇航空員駕噴氣式飛機至安東擔任防空，並可越過中國邊境數里，但需學會幾句中國話的口令聯絡。如此，下月10號可由瀋陽移安東。」11月1日，蘇聯空軍開始在鴨綠江上空域投入戰鬥。參見〈周恩來給毛澤東和劉少奇的信〉（1950年10月29日），載《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三冊，頁427；〈沙哈洛夫致斯大林電〉（1950年11月2日），АПРФ，ф.45, оп.1, д.335, л.71-72。
- ㉕ William Stueck, *The Korean War: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139-41; "Editorial Note", in *FRUS, 1950, Korea*, vol. VII, 1542.
- ㉖ 毛澤東：〈戰爭應從最壞方面着想〉（1950年12月3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上卷，頁388；《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一卷，頁254。
- ㉗ 〈周恩來總理接見印度大使潘尼迦的談話記錄〉（1950年12月12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05-00009-01；K. M. Panikkar, *In Two Chinas*, 118。
- ㉘ 毛澤東：〈關於朝鮮戰場形勢和我軍作戰部署給彭德懷等的電報〉（1950年12月21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頁731。
- ㉙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頁108；"Austi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24 December 1950), in *FRUS, 1950, Korea*, vol. VII, 1594-98。

- ⑳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著：《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戰史》（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0），頁63-64、68-69。
- ㉑ 關於提議的內容，參見“Editorial Note”，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1, Korea and China*, vol. VII, pt. 1（以下簡稱FRUS, 1951, KC-VII-1），ed. John P. Glennon, Harriet D. Schwar, and Paul Claussen（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3），64。關於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內對提議內容的討論，參見William Stueck, *The Korean War*, 152-54。
- ㉒ 1951年1月10至11日，彭德懷在同金日成、朴憲永談話時提及當時「志願軍實際情況」：「西線三個戰役六個軍……總共約減員近五萬人。東線九兵團……總共約減員四萬一千餘人。運輸困難，給養很差，許多棉衣被毯被敵汽油彈燒毀，送補不來，體力大為消弱，戰鬥單位人員已很不充實，因此，迫切需要補給休整，並恢復交通，改善運輸等工作，以便再戰。」參見〈彭德懷同志與金日成同志、朴憲永同志談話紀要〉（1951年1月1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檔案館，宗卷號不明。
- ㉓ Dean Acheson,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My Year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69），513；William Stueck, *The Korean War*, 153-54。
- ㉔ 〈中國政府關於朝鮮停戰談判問題的備忘錄〉（1950年1月11日、14日），載《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四冊，頁34-36。周恩來向金日成通報此事時強調：「備忘錄的提議已得到蘇聯政府的同意並願予以支持。」參見〈周恩來給柴成文關於將中國政府備忘錄呈送金日成首相的電報〉（1950年1月14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檔案館，宗卷號不明。
- ㉕ 〈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長周恩來 覆聯合國第一委員會電〉，《人民日報》，1951年1月18日，第1版；〈周恩來關於拒絕聯合國提案與潘尼迦談話記錄〉（1951年1月17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13-00068-01；“Editorial Note”，in *FRUS, 1951, KC-VII-1*, 91-92。
- ㉖ 〈關於印政府對周外長覆聯合國電的詢問 我外交部答覆印度大使〉，《人民日報》，1951年1月24日，第1版。
- ㉗ 〈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開展抗美援朝愛國運動的指示〉（1951年2月2日），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二冊，頁24-27。
- ㉘ 〈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議要點〉（1951年2月18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頁126。
- ㉙ 王焰主編：《彭德懷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頁469-70。
- ㉚ 《彭德懷年譜》，頁480-81；《彭德懷傳》，頁451-53。
- ㉛ 毛澤東：〈關於朝鮮戰局和我軍採取輪番作戰方針給斯大林的電報〉（1951年3月1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二冊，頁151-53。
- ㉜ 杜平：《在志願軍總部》（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頁237-53。
- ㉝ 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4），頁741-42。
- ㉞ 〈周恩來與蘇共領導人會談記錄〉（1953年3月21日），轉引自沈志華：《毛澤東、斯大林和朝鮮戰爭》（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頁470。
- ㉟ 〈周恩來致毛澤東電〉（1953年3月21日），載《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八冊，頁200-204。
- ㊱ 毛澤東：〈同意所提戰俘交換方針〉（1953年3月22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中卷，頁133。
- ㊲ 〈劉少奇在第一次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報告〉（1951年5月7日），轉引自楊奎松：《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第一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頁184。